

关于五邑善后处长陈德春 在江门的经历

——兼对《粤军攻打陈德春》一文的商兑

许梓堂

《粤军攻打陈德春》（下简称“粤文”）是陈占标辑的《辛亥革命后江会地区政局发生的事件》（载本刊第十七辑）的最后部份。读后，觉得该文语焉不详且有失实之处。兹将我所知的写出来，借以互相印证。当然，个人所知有限，也不一定正确，望识者斧正。

奉谁之命进驻江门

陈德春是奉谁人之命进驻江门？对这个问题，《粤文》只笼统地说：“陈德春原是桂系莫荣新旧部，归顺陈炯明而受到宠任驻防江会。”但人所共知，陈炯明率部从闽回粤，驱逐旧桂系后，孙中山于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日任他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的。如果陈德春是受陈炯明派遣的话，其进驻江门的 earliest 时间，应与陈炯明主理省政时间相同。其实，这是不对的。陈德春早在这之前，奉桂系督军莫荣新之命已进驻江门了。

在旧桂系统治广东时期（1917年——1920年），驻防江

门的先后有三个部队，次序是：黄传善部、黄业兴部、陈德春部。按这个次序，可以肯定地说，陈德春是接替黄业兴部进驻江门的。至于何时交接，长期以来弄不清楚。

为了弄清陈氏进驻日期，一九六四年我在江门曾做过一次社会调查，访问过一批能亲见其事的长者，除了那些回答记忆不清的外，大多数说，“是民国八年（1919）。”在这一年那个时候？有的说：“是年秋天。”多数说：“是年冬天。”有的说：“是春节前。”但大家都说不出有力的证明，只有一位说到这样一件事：“陈德春到江门时，仅是一位团长，不及一年便升为旅长。不久桂系就被逐出省境了。”据以上长者的回忆，我认为陈德春进驻江门的时间，不是一九一九年底就是一九二〇年初。

当然这只是推算，不一定准确，尚望知情者指正。但决不是“归顺陈炯明”后而驻防五邑的。

是军长，还是旅长

陈德春的军职究竟当到多大？《粤文》据台湾版的《中国国民党八十年大事年表》，说“一九二二年二月四日孙大总统任陈德春为中央第四军军长兼粤军八属各军总司令”。为此，《粤文》称陈部的王定华、陈嘉尉（威）为旅长，又说陈部还有三个团散驻江会，也即等于一旅。这样一来，陈德春属下便有三旅之众，加上其他直属部队，与其军长的身份相差不太远了。

台湾版的“国民党大事年表”，我没有看到，不便置评。但我想，即使该年表是百分之百地据档案材料而编成，

也只能供我们参考。因为常识告诉我们：档案与现实，往往是有一定距离的。现据我手头上掌握的点滴材料，看看现实中的陈德春吧。

先看看陈德春的来历。陈德春是广东钦州人，其出身不详。民初，是桂军一位营长。一九一三年七月当广东独立讨袁之际，他率部随袁的爪牙龙济光由梧入粤，充当保皇派的打手。一九一六年六月，袁世凯在全国声讨中暴毙，龙济光也跟着失势，陈投降了旧桂系，接受莫荣新的收编，从此成为桂系的一员。以陆荣廷为首的旧桂系占据广东地盘后，势力迅速膨胀，莫荣新由广惠镇守使升为代督军、督军，陈德春也由营长升为团长，并得到宠信。一九一九年夏，莫荣新为剪除地方派势力，任该系军长林虎为肇罗阳镇守使，进驻前省长李耀汉的老巢——肇庆，原驻江会地区的林部，为此也先后奉命调防。这样，莫荣新便委陈德春为五邑善后处长，接防五邑地区。

再看看陈德春的兵力。陈德春是以一团之众驻防五邑，他的部署是这样的：团部设在江门水南祖庙，林权初为参谋长，王光海（东莞人）为副官长，赵欣甫为军需长，此外还有军法处长；团的直属连队驻团部周围：蓝焕章的卫队连驻团本部，黄汉的保卫连驻范罗岗，钟孔龙的炮兵连驻狗山，吴标山的机枪连驻紫来，王定华的第一营驻台城，管台山和赤溪两县；陈嘉尉的第二营驻公益，管开平和恩平两县；黄其胜的第三营，营部设江门紫泥的叶家祠，管新会一县。陈德春就依靠这一团的实力，登上五邑“皇帝”的宝座，成为辛亥革命以后驻防五邑时间最长的小军阀。

第三，看看陈德春的表现。从陈德春到江至被认为当上

“军长”的时候，恰恰是两年左右。在这段时间里，他的表现如何？其突出的表现有三：一、猖狂地贩毒庇赌，借以敛财，具体情况下面再谈。二、扩充实力，伺机往上爬。结果，陈德春到江门后不到一年，便由独立团长升为第五独立旅长，这是他投靠桂系后第二次升官。与此同时，他的主要干部自然也跟着升了级，只有炮兵连长钟见龙还没有适当安置，后来王光海当了新会县长，所遗副官长缺便派钟见龙接充，才算做到皆大欢喜。三、时刻窥视政治风云变幻，看风转舵，以求保本增利。以陆荣廷为首的旧桂系军阀，在广东的倒行逆施，已激起各界人士的无比愤慨。一九二〇年夏秋间，在孙中山的指挥下，讨伐旧桂系的战斗打响了，其中以陈炯明为总司令的援闽粤军，军威最壮，捷报频传。在各路军围剿之下，桂系败局已定。善观风转舵的陈德春，及时指派副官长王光海出马，积极钻营，终于与陈炯明取得默契。当然这个默契的内容秘而不宣，但是结果却路人皆知：陈德春没有与旧桂系同遭覆灭。一九二一年夏，已被逐出粤境的旧桂系，在北洋军阀的支持下，又在粤桂边境挑起战争，妄图卷土重来。为此，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统率大军反击桂系的挑衅。陈德春瞄准了这个机会，将王定华团交给陈炯明，开上了反桂前线，以示对新主子的忠诚，对旧主子的决裂。陈德春这个团，虽一去不返，他却得到陈炯明的信赖，继续安坐在五邑“皇帝”的宝座上，岿然不动。陈德春这一着，我们暂且不管其主观动机如何，从客观效果看，却是他在江门两年来表现得最出色的一件事了。

据上所述，从资历、兵力、表现上看，陈德春够格当上军长吗？再说，就当年众多的粤军将领中，能被任为军长的

仅有三数人，如陈炯明、许崇智、李福林等，陈德春的资历能跟他们比较吗？将陈德春骤升两级能服众吗？况孙先生这时正驻桂林，怎会给陈德春戴上军长的头衔。这史料是不足置信的，而把陈德春在五邑的兵力说成为三旅之众，更是无稽之谈。总之，陈德春最终仍是一位旅长，这是地方人士所共知的。

脚踩两船，招致覆灭

陈德春为什么会被歼灭？《粤文》是这样说的：一九二二年“六月间陈炯明叛变，而陈德春率部盘据江门，遥为陈炯明响应，並委派部属王光海（副官长）接替由孙中山委派的新会县长陈永惠。……因此，粤军讨逆军决定拔去陈炯明留在江门这个据点。”其实，问题远不会这么简单。

谁都知道，陈炯明与陈德春过去并无历史渊源，他们之间的关系只是利害的结纳。前面说过，当陈炯明率部从闽回粤，驱逐旧桂系之前后，陈德春尽巴结之能事，取得陈炯明的庇护，保住了五邑地盘。当陈炯明叛变孙中山陷入四面楚歌的时候，为要陈德春替他卖命，就反过来对陈德春加以拉拢，既封陈德春为八属联军司令，又委其副官长王光海为新会县长，借以扩张其反革命的势力。这一面是《粤文》所看到的。

但另方面讨伐陈炯明的联军，在孙先生的策划下，滇、桂、粤西路讨贼军于一九二二年底在梧州组成，並立即指挥东下。据曾参与此役的英雄的回忆，当时联军有两个攻击目标：主力向广州之敌攻击前进；“粤军第三师从梧州河右岸出岭溪向江门，四邑之敌攻击前进。”一九二三年一月中旬，

联军主力攻入广州，陈炯明败退东江。然而，此时的陈德春仍安然无恙，又一次化险为夷。是否粤军第三师进攻江门失利？非也。原来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刻，陈德春看风转舵，按兵不动，反而迎接讨贼联军。因此，粤军第三师在进军途中奉命，主力转向广州，只派一个团进驻四邑（驻地不详）。这一面却是《粤文》所不知道的。

陈德春向广州的革命军政府投诚以后，孙中山先生以宽广的胸怀曾寄望于陈德春，任命他为大元帅行营五个主任中的一员。可是这个行营还没来得及成立，以沈鸿英为首的滇桂军将领，企图独吞广州地盘而发动变乱，借开军事会议（又称江防会议）之机，突然扣押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并强行将其旧部粤军第三师缴械。迫使其他粤军纷纷离开广州。在此情况下，二月三日，孙中山命设大本营江门办事处，以便组织讨伐沈鸿英的力量。

大本营江门办事处的设立，本来是对陈德春极大信赖和依重，但鼠目寸光的陈德春却视为灾难将要降临，小则怕粤军蜂涌而至，丧失独占的天堂，大则怕沈鸿英的报复，身家性命也保不了。于是，他又转舵了，采取脚踏两船的态度以求保险，一面暗中与沈鸿英密使往还，通风报信，一面敷衍军政府，使办事处迟迟不能建立。陈德春的叛卖行径很快为军政府所侦悉，遂决定把这投机取巧、反复无常的陈德春予以歼灭。这就是陈德春招致被歼的主要原因。

歼灭陈德春的任务，主要交由第三师副师长郑润奇执行。此时的第三师除一个团外，其余已被迫解散。接受任务后的郑润奇，首先采取两项措施：一召回旧部重组队伍，二采用策反战术瓦解陈部。先父仲焘翁就在此时参加第三师

的，他这段经历可概见这两项措施执行的点滴情况。现将先父对我讲过的话记录如后：

一九二三年二月上旬的一天，我在香港与朋友麦翰文相遇。他是南海盐步人，魏邦平的老部下。当他知道我现已失业时，就说：“这次，我们肩负重组第三师的任务而到香港的。欢迎你参加我们的队伍。”我以从未摸过枪为由，婉辞了他的好意。接着，他又说：“军队除打仗外，还有许多工作要人做。比如书记官我看你最合适。不过你考虑一下才答覆我吧。”隔了一两天，麦又约我相见。我们坦率地谈了时局问题。最后他说：“我们三师已接受攻打陈德春的任务。这一仗，许胜不许败，否则我们粤军就没有立足之地了。我们除准备强攻外，还准备软攻，用策反办法瓦解陈部，收事半功倍之效。但准备进入新会这班人，包括我在内，都不是你县人，非常需要借助于你，无论从公从私都非帮这个忙不可。”稍停，他又说：“至于你以后的去留，任君抉择，决不食言。”话已讲到如此程度，我尚有何言呢！这样，我便有了第一个军职——粤军第三师第五旅旅部二等（同中尉级）书记。

我的第一个任务是：为策反队伍在会城安排一个可靠的立足点。经过商量，我从香港返回会城，以办俱乐部为借口，租了会城西隅街黄家祠，并做好了食宿的准备，便马上返回香港复命。接着，以第五旅旅长李雄伟（三水人）及旅部少校参谋麦翰文为首的共十人，由我陪同从香港便服到了会城，住进黄家祠。我清楚地记得，这时已是除夕晚了（按：这年农历除夕，即一九二

三年二月十五日)。

在黄家祠，对外我是俱乐部主人，跟地方人士应酬，掩护这班人活动；对内我是总管，安排他们的生活需要。策反工作，不是我的任务，具体情况就不清楚了。在会城住了不及一个月，李雄伟带了两个随员先离开会城。不久，歼灭陈德春部的战斗打响，并很快胜利结束。至四月初，我随麦翰文调离会城。

此外，关于攻打陈德春之役，尚有数事值得一记：

一、此役发生日期，我尚未找到文字记载，但据亲见其事的江门长者回忆，大家都说是“民国十二年农历二月初二”。查是年农历二月初二，即是一九二三年三月十八日。这与《粤文》所说相同，可信属实。

二、参加此役的粤军，主力是第三师郑润奇部，还有江防司令陈策部，西江讨贼游击司令周之贞部。粤军第一师有没有参与则众说纷纭，只好阙疑了。至于《粤文》提到的“粤军第一师师陈济棠部”（原文照录）“李济深师的张发奎团”曾参加此役，这就连部队的番号也搞错了。查李济深、张发奎、陈济棠等，当时都是第一师师以下的官佐；如果他们真的参加此役，应该说是粤军第一师梁鸿楷部。

三、战斗的经过。这一仗采取突然袭击的战略，主攻的目标是水南祖庙司令部。对陈部的其他据点，则围而不打，防其异动。是日上午五时总攻开始，陈德春曾率部负隅顽抗，以待增援。但由于事前做好了策反工作，陈的其他部队均抗不从命。陈德春深知大势已去，便化装只身逃离司令部。至此战斗结束，刚好是上午七时。

从此，江会地区就成为大本营完全控制的地区，一时军

队之众多、番号之复杂，成为江会地区历史上所未有。

只身潜逃的经过

关于陈德春潜逃的经过，《粤文》所说的和我们所了解的，也有很大的出入。

陈德春在枪林弹雨中逃离司令部时，为流弹所伤。但他第一个落脚点，不是水南跌打医生李牛处，而是竹排头地头虫赵林（此人就是后来在江门当律师的赵汉俊之胞兄）开设的柴栏里。陈德春一见赵林，就吩咐赵速请陈波来见他。显然，这时的陈德春已顾不及一点皮肉之伤，而是希望得到江门黑社会头子、自己贩毒庇赌的拍档的帮助，尽快逃离江门了。通过赵林的传话，陈波匆匆地带了两名助手应召而来。陈德春对陈波说：“我想到澳门去，越快越好。请多多帮忙”。陈波稍作思索，讲出自己的打算，陈德春认为比较安全后，一面马上派人请来江门著名的跌打医生李聪，替陈医治外伤；一面派人请来一艘住家艇，亲自护送陈德春到外海的新沙，再转乘来往江澳的大成渡，将陈德春安全地送到澳门去。

以上就是陈德春逃亡的全过程，既简单又快捷，在一天时间内就脱离了险境。而《粤文》却把它复杂化了：陈德春在逃亡过程中，在不同的三个地方落脚躲藏，时间拖了十一个多月，最后雇了海关的缉私舰才送到澳门。这是不可信的。在这里，试指出一点破绽就够了：帮助陈德春逃亡的人是谁？《粤文》指的是陈联佳，我说的是陈波。殊不知这二陈正好是兄弟俩。陈波为兄，是当时江门黑社会的大哥（即首

领)；而陈联佳只不过是其兄羽翼下的一名助手。陈德春在逃亡的生死攸关的时刻，为了安全，他会看中谁做其保镖最适合？当然是选其兄舍其弟的。不久，香港《循环报》披露了陈德春逃亡事，新会县长赵植芝下令逮捕的是陈波。此时陈波不得不逃往香港。从此陈联佳继承其兄的衣钵，逐步为成江门的巨富。如果是陈联佳干这件事，那么结果就会倒过来了。陈波当时为什么突然离去了江门，人们多是清楚的。

陈德春被打跑了，王光海又如何？《粤文》说：“陈德春被打败后，新会县长王光海也逃之夭夭。粤军部委军官王熙文权署新会县政。”从这段话看，新会县长王光海离职的日期，也就是陈德春被歼逃亡的日期，即一九二三年三月十八日了，而王熙文的权署县政的日期，也该是三月十八日稍后的事。这该是合情合理的演析。可是，跟《粤文》辑者另辑的《中华民国时代新会县四十六任县长简介》（见本刊第五辑。下称《简介》）对照，却发生矛盾。《简介》说：第二十任县长王光海是“一九二二年十月上任，一九二三年一月去职。……（事见当年的《四邑平报》）”，“第二十一任县长王熙文，一九二三年一月到任，同年三月底卸任，……王氏于四月一日移交赵植芝。”，而“王氏属于魏邦平部下，随军来江会进攻盘踞江门的陈德春，陈氏败退，被派兼任县长，自刻关防”。根据上述两文，有两点是共通的：一、在粤军攻击下，陈德春与王光海是同时滚蛋的；二、王熙文是接王光海继任县长的，是在击溃了陈德春部之后。而矛盾的焦点是交接日期：《简介》说是一九二三年一月，而

且有当时地方报纸《四邑平报》为证。为什么会出现自相矛盾？究竟那一说是正确的呢？我因找不到《四邑平报》印证，望辑者自行校正，对弄清这个地方史实，是有必要的。

搜刮的两把利刀：贩毒和包赌

在那军阀统治时期，差不多没有一个军阀不借烟赌乘势发财的。《粤文》虽也指出了陈德春这一点，但没有具体内容。陈氏统治五邑比别的军阀时间长，贩毒的规模又比别的军阀大，孽钱积得就比别的多。据一九二六年七月九号的《四邑平报》载，陈氏于是月二日病逝澳门，尚“拥有数十万孽钱。”可知其毒害五邑之烈。兹将调查所得辑录于此，以实本文。

据说，陈德春原来就是一个鸦片贩子，靠原籍粤桂边境这个地盘，武装押运鸦片而起家，当上桂军营长。也由于贩运鸦片的关系而结识龙济光，并随龙进入广东。后又得到江门这个水陆称便的防地，便变本加厉地干起走私贩毒的罪恶勾当。

由于陈德春是一匹识途老马，其走私贩毒的全过程，包括购、运、存、销，都有他自己的特色。购：以原籍钦州为基地，派亲信负责，或到云贵、或到安南、或到广州湾，只要那里有利可图、利润优厚，就到那里去采购烟土，因此他的货源充足，进价相宜。运：从各处购进的鸦片，均先运到钦州，然后以差遣舰武装押运至江门。存：所有运到江门的烟土，均暂存在水南祖庙司令部，这里是一个最安全的仓库。销：依靠地方势力，组成一个精干的推销网，将鸦片销到四面八方去，以赚得更多的利润。

在这群推销员中，江门黑社会头子陈波是最得力的一个。陈波与陈德春的勾结，是通过三江乡人赵其华为中介的。所以陈德春授赵其华为“名誉”副官，长驻陈波的花篮巷俱乐部作为双方的联系人。由于陈波通过黑社会的渠道，替陈德春推销了不少鸦片，得到陈德春的赏识，认为此人有用；陈波替陈德春经销鸦片后，不仅捞到不少油水——手续费，而且靠山大了，势力大增，从而登上江门黑社会的首座。双方合作均感满意。这样，以鸦片为媒介而相识的二陈，遂结成莫逆之交，陈德春便派其长子陈伯承（绰号奉神鸡）取代了赵其华，成为二陈之间的联系人。

不仅陈德春贩毒，陈部的官佐也是一伙贩毒分子，大赚孽钱，举两个例子以概见其全：

其一、以第三团团团长黄其胜为首的贩毒集团。第三团团部设在江门沙仔尾紫泥路叶家祠。而该区的长堤路段，是经营南路生猪、三鸟的，九八栏集中地。这些九八栏几乎每天都有货船自南路来，将生猪、三鸟交九八栏代售。黄其胜就利用这些货船作为贩毒的工具，来发横财。为此，他就串通该区地头虫叶纪南（江门鹅溪里人）、中华戏院经理赵作荣（三江乡人），让他们两人到九八栏去活动，结果吸收了同益鸡鸭栏的谢九、源泰猪栏的何某（江门白沙人），广祯祥、普和栏老板等，以常安坊的岭南俱乐部为场所，组织了一个庞大的私烟集团。这个集团由于利用原商业关系，组织简单，运带方便，皮费轻，因而获利甚巨。后来，黄其胜仍感腰包装的不够多，又伙同叶纪南、赵作荣，将部分烟土自制烟膏，在其防区遍设烟局，搜刮更多不义之财。

其二、以卫队营营长蓝焕章为首的私烟集团。蓝焕章是

陈德春的妻舅，他恃着这种特殊关系，肆无忌惮地组织团伙干贩毒活动，他指派其军需黄华甫（吴川人）出面，组织两个贩毒集团：一是西江贩毒集团；二是外海制烟集团。第一个集团，跟黄其胜的手法差不多，利用其驻地的杉栏、柴栏，跟西江上游的商业关系，由该区的地头虫、柴栏老板赵林（三江人，绰号崩牙林，即上述陈德春亡命先到其柴栏躲避的）出头串连，组织杉栏、柴栏老板如万和杉栏的梁仲年、新盛美杉栏的黄锡予等，利用杉排、柴船，从西江上游偷运大量烟土到江门营利。第二个集团，是黄华甫与江门毛巾织造厂司理李子绅、外海乡的恶霸五哥湛组成，利用外海这块地盘，制成鸦片烟膏，用铜研精装，销往港澳一带，赚了大笔孽钱。黄华甫尝到了贩毒的甜头后，当陈德春被击溃时，仍赖在外海不走，终于被江防司令陈策部捕获，罚了一笔巨款才换取自由。这是题外话不多谈了。

陈部官佐大多是见利忘义之徒，常因利益不均而嫉妒、闹矛盾，甚至火拼。一次，陈德春为母祝寿（这也是当时官场的敛财手段之一），派副官沈寿臣乘差遣舰回原籍接母到江。卫队营长蓝焕章认为机不可失，派军需黄华甫同往，夹带了十八只皮箱烟土返江。事为保卫营长黄汉知悉，愤陈德春厚此而薄彼，特派瞿帮统率武装在江门缉截，双方大打出手，结果将全部烟土抛入鱼塘，以泄私愤。这桩狗咬狗骨的闹剧，一时成为江门街谈巷议的笑柄。

总之，自陈德春进驻江门后，由于他们一伙的兴风作浪，遂使江门变为我省一个著名的贩毒中心。

为了敛财，陈德春除了贩毒之外，对于赌，一直抓紧不放。赌，又成为他搜刮民脂的一把尖刀。

五邑历来赌风炽烈，以江门为例概见一斑。辛亥革命后的三几年间，政府明令禁赌，在江门市面看不到公开的赌馆，而民间的私赌一直不断，由公开转为秘密，不敢过分猖狂。到一九一五年七月，龙济光借口救济广东水灾为名，招商承餉开办了山票、铺票后，驻防江门的济军团长李文运，便串同新会警卫军统领赵月修，以每日二百元规费，包开了杂赌。所谓杂赌，是指牌九、牛牌、啤牌、骰仔等。由于承商互相争夺，从第二个月起，规费增至每日五百元。这是辛亥革命以后，由驻军包赌的开始。然李、赵辈仍有所顾忌，仅三数月就不敢再包了。到旧桂系统治广东时期，则不顾一切，全省大开赌禁。这时，江门市挂着承办防务经费灯笼的番摊馆，则遍地皆是了。据说，这时江门一埠的赌馆，前期每日一千元；后期增至二千元以上。陈德春一来，当然是继承了前任的所为，继续公开包赌了。唯一不同的手段，就是为了保障承包者的利益，同时出动大批军警，搜捕私赌，从严罚款，一箭双雕，真是州官放火。旧桂系倒台后，陈炯明主理省政，他一向以禁赌来争取民心，而背地里却纵容部属在防区内包赌。所以在这期间，除广州市区外，全省各地的赌博从没有间断，五邑当然也不例外。

陈德春驻防五邑，历时三年多，跨旧桂系和陈炯明统治两个时期。在此期间，江门的赌一直没有间断过，单赌餉一项，以三年时间、每日两千元计，就高达二百多万元。加上五邑其他地方的赌餉，那更是难以统计的一个惊人的数字了。

新会县农业技术学校的创办与发展

曾 里

新会县地处珠江三角洲，农田肥沃，是个鱼米瓜果之乡。农业生产是经济基础，而农业与技术人员又决定农业生产能否发展。培养农业技术人员，历来为人们所重视。1947年秋，新会县府在会城务滋堂办起一所“介寿”农商职业学校，设农业、商业两个专业，招收学生各一班。1948年该校迁到风采堂，分专业办初一、初二年级共四个班，任莫朝英为校长，何洪涛为教导主任，教师有苏泽民、陈锦元、谭熙孟等。1949年解放后，县一中的书院开办，商业班并入一中，保留两个农业班附设在一中。1951年春农职班迁到礼乐示范农场，由县人民政府农建科主办，称为新会县农业学校（初级专业），派谭匀秉代理校长，边教学边生产劳动，既是教学基地又是生产科研场地。1952年农校又迁回会城关帝庙旧址，在河口农场参加生产实习。1954年迁到外海莘隐中学旧址，派何蔚钧任校长。1956年秋，省农业厅决定将东江、中山农校合并到新会农校，改为省办中专，调新会县副县长廖信任校长，何蔚钧为副校长，面向佛山地区招生，毕业生由省统一分配。

1958年“大跃进”年代，农业要大上快上，人才不足怎么办？靠自己培养。中共新会县委为了迎接新形势，根据县的实际情况，决定创办一所新型的“农业专科大学”（简称农

专)，聘请华南农学院农科所下放我县参加农村生产劳动的教师任教，设置农学、园艺两个专业，面向全县各公社招收青年基层干部和从事农业生产的青年积极分子入学，实行半日课堂教学半日生产实习，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农业技术与当地生产实际相结合，拟用两年时间学完大专基本课程，再到社、队实习，考试毕业后，安排到社、队农业生产第一线当技术骨干。“农专”由县长肖辉兼校长，调我任专职副校长，调原新会农校副校长何蔚钧为教务长，聘请华农教授黄耀祥以及罗发、彭哲、邵远等八位为教师，按农学、园艺两个专业，自己编印教材，在会城城东挂宝庙修建校舍，开辟校内实习农场二十亩。1958年8月招考第一届新生入学88人，编两个学习班，学生学习费、伙食费、生活费，由县财政拨给一点，各社、队补贴一点，勤工俭学解决一点。

1959年1月，省办新会农校因改制为佛山农学院迁去佛山，县委决定“农专”搬到外海农校旧址，该处有教学大楼二座，办公楼、学生宿舍楼各一座，还有会堂、食堂兼用的大平房一座，农场管理室等，整个建筑面积近五千平方米。有校内农场面积140亩，计有水稻田58亩，蔬菜田32亩，经济作物田28亩，苗圃12亩，鱼塘10亩。解决了教学课堂，师生宿舍，生产实习农场和生活、活动等实际问题。迁入新校址后，学校重新规划与安排今后办学与发展。1959年春季在社、队招收第二届新生78人，秋季在全县初中毕业生中招收100人，分农作物、果蔬两个专业四个班。当时省农科所、农学院下放劳动的教师陆续回广州去，根据实际情况，县委决定将“农专”改称“新会县农业技术学校”，确定为半日制性质

的中专学校，并向省高教局中专处、省农业厅登记备案，决定任我为校长，何蔚钧为副校长兼教导主任，县教育局调来几位教师，龚文藻为副教导主任兼教语文课，陈润权教政治课，张吕文教化学课，黎家猷教数学课，李超强教语文课，黎国玲教生物课，赵梅友教物理课；县农业局调来几个农业技术干部，谭葆廉教果蔬、育种课，黄茂辉教植保课，林振健教育种课兼农场水稻育种技术指导，李咨平教土壤测量课，刘昆洞、曾君送教畜牧、兽医课；还有省农校派来的本科专业教师梁奇教林果课兼苗圃绿化技术指导，林天佑教农作物栽培课，谭匀秉教植保课。教学采用全国统一农业中专课本，两年共十五门课程，计有政治、语文、物理、化学、数学、植物（生物）、土壤肥料、耕作、良种繁育、农作物栽培、林果栽培，植物保护、畜牧兽医、气象、农机常识等。在教育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为了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学校提出了以教学为中心，以生产为基础，一手抓教学，一手抓生产的口号，采用“一条龙”的教学方法，为使学用结合，围绕农作物生产季节，安排专业课与文化课；为使课堂教学与现场教学结合，小农场作为教学基地，进行了十个生产研究项目的试验；为使学校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每学期安排一周时间组织学生到社、队去生产实习，接触实际，联系群众，增长知识。

农校建立了中共党支部，在学生中发展团员，建立了团总支，注重在学生中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入学时进行理想前途教育，号召做一个有文化有技术的新式农民，使之明确学习目的，确立专业思想。还经常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艰苦奋斗的教育，培养集体观念、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要求学习